



蒋路文存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路文存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路文存/蒋路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02-004607-X

I. 蒋… II. 蒋… III. 蒋路-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888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蒋 路 文 存

Jiang Lu Wen Cun

蒋 路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4.75 插页 9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4607-X

定价 52.00 元

怀念蒋路

(代序)

孙绳武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在中国,从草木稀少的荒野发展成为一片蓊郁的绿洲,几乎用了一百年的时间。鲁迅、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这几个辉煌的名字曾经光照译史,代表了它的最初的艰辛的开拓阶段,而且也奉献出令人惊异的一批成果。但到了世纪中期,这些先辈有的已经辞别人世,有的虽仍在奋斗不止,但世界的变化和人民的要求,显然在期待必须有新的力量加入,补充这个行列,承担一个新时期的任务了。

蒋路同志就是在这个时期,经过曲折的路途,一步一步寻求着方向,选择了介绍俄国文学这个含有无限吸引力的目标的。

他生长在广西全州,长大后就读湖南长沙。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发动侵略战争那年,他才十七岁。这场战争震动了中国人民,从苦难中惊起,从昏沉中醒来。书生希望报国,青年甘愿在战斗中献出生命。旧中国的军队本来是压制百姓的腐化武装,这时为了急忙适应形势,到处贴出招收政治工作人员的布告。蒋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怀着满腔热血,考入一支部队,随军从遥远的湖南开拔到了河南,驻扎在一个小镇上。他连续看到了军官对劫掠或招募来的士兵的残酷殴打。他的心不能容忍这种暴行。幸亏一个比

他经验略多些的同伴，劝他一同逃走。这时已经有许多青年投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他们也在当年8月到了枸邑县陕北公学这个新的天地。那里的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热烈的。然而好景难长，次年夏天，校领导动员他重返国统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广西这时在李宗仁、白崇禧统治之下，与其他省份略有不同，进步力量还有活动的余地。蒋路不久考入桂林中苏文协附设的俄文专修学校，受担任教学的地下党员孙亚明先生培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此之前，已有几位上海、香港的文化人开展桂林的文化工作，发行刊物，这给蒋路提供了发表译作的机会，有小说也有评论。可以说这是他在俄苏文学翻译上的学步时期，一生道路的开始。1944年秋，日军进攻桂林，大批文教人员和市民撤退，蒋路也同他们一起到了重庆。我们就在这个时期相识。经友人介绍，他受聘于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这是一所摆脱传统教育方式，提倡劳动与教育结合，培养一代新人的学校。根据蒋路的专长，由他主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确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在当时国统区的院校中，正式设置这门课程者，仅此一家。”为向那些有进步思想的学生讲好这门课，他认真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所依据的主要教材，就是那两年刚刚经由苏联进出口公司，通过战时的路途，运到重庆的两届苏联十年制学校的俄文教科书。我以为，这短短两年的教学工作，使蒋路系统地了解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对他后来毕生从事俄国文学研究很有益处。建国初期，他和友人共同把其中布罗茨基主编的那个新的版本译出，对当时的大学文科教学也是有过相当影响的。

大约在1945年下半年，或者更晚一些，因抗战胜利，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年轻人，都先后离开了重庆。

我是1946年底到南京的。次年春天，他从桂林出发，路过南京。我们在上海路一家餐馆中匆匆共进了午餐，他就又提起箱子

去车站赴上海了。他原本是应邀去上海一个苏联的机构工作,但到达后才知事情有了变化,只得去乡间一位友人处暂住。这是他的一段闲居时期,其实也是他到达上海后又一段紧张工作时期。他感到一时工作难以固定下来,就从图书馆借了俄文版屠格涅夫文集的回忆录卷带到乡间进行翻译,译出后交给巴金先生,经过他审读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他这个译本尽量传达了屠格涅夫的文笔风格,细腻而清新。在中国,这也是继《猎人日记》(耿济之译)之后,直接从屠格涅夫赞美的俄罗斯语言译为中文的第二本书。在俄国文学的中文翻译艺术上,也可称为新的一页。

这年的冬天,他终于由戈宝权先生推荐,进入苏联政府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出版社编译部,从乡间回到市内居住。这时上海租房奇贵,动辄索取金条。他只好白天去南京西路的编译部工作,晚上回沪西弄堂里,出版社的一个小印刷厂的校对室睡觉。为了不占据校对室的面积,他睡在屋顶下靠墙壁搭建的丈余长的木阁子里,用一个简单的木梯上下。

他的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是很很不正常的。上海坐写字间的人,尤其家庭不在上海的人,下班大多在街市上找个地方吃晚饭。1948年我到上海后,不久也进入时代出版社,我的办公桌就在蒋路的对面,下班后常常在一起用餐。1949年是上海最混乱的时期,尤其是蒋经国企图用发行“金元券”减缓国统区经济崩溃之后,物价一日数变,商店朝不保夕,市面人心惶惶。有一天我们从时代编译部下班出来,想顺路在路上吃饭,但五六家餐馆都提前打烊,告以饭菜售完。最后刚刚挤进一家普通的便餐店,掌柜的马上把门关上,将还想进入的客人堵在门外。我们倒还能坐下饱食一顿。这后来也成为我们终生对上海的回忆和笑谈。

上海解放后,时代出版社编译部迁至淮海路的逸村。蒋路、孟昌和我三人同在三楼的一个大办公室里,生活开始安定。蒋路

后来常说：“从此再没有被特务追捕的噩梦。”

我们进入时代社后，各人的翻译选题一般都是社主管人罗果夫指定。蒋路先译了史坦因著的俄国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评传》、高尔基的《忆列宁》、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星》，也为戈宝权先生主编的《苏联文艺》杂志供稿。他后来不怎么提起这三本书。其实这三本书今天仍是有可读的价值，而且这三本书属于三种不同的类别，它们的译笔在当时也是很出色的。

他对于《怎么办？》一书，确实向往已久。大约 1935 年左右，有一本小书在上海出版，这就是女翻译家李淑译自法文的《何为》。它只有几万字，装帧朴素，是一本不很起眼的小书。然而它就是法译者刻意用压缩方式，为法国读者编写的俄国名著《怎么办？》的简本。在当年，这本书的印数肯定极为有限。可是，有一本竟像光焰闪闪的种子，落在遥远的广西的一个青年的心上。蒋路在上海一发现俄文原著，便向社长罗果夫提出想译这本书，罗果夫很快同意了。在接下去的一年多里，他以专注不移、勤奋始终的精神翻译这本大书。办公室平常总是静静的，只有在译到最动人处，他才会从桌边站起，边抽烟边在室中踱步，并激动地向我叙说这一大段的情节。我至今还记得谈起拉赫梅托夫为了锻炼从事革命工作的意志，甘愿睡在钉板上，薇拉对未来社会主义下如何改善劳动条件的三个梦时，他从书中体会到的感动与兴奋。也就在这种随译随谈的过程中，我有幸成了《怎么办？》中译本的第一个听众。

这个完整的译本是在原作出版近二十年后才在中国问世的。中国的革命形势已远远地走到了前面，它面临的任务和要求已不相同，因而大多数中国年轻读者欣然地、平静地接受了它。为了从历史的经验中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这书的命运，译者除了为译本撰写了长序外，后来他还特意写了《〈怎么办？〉评议录》和《合理的利己主义》两文供读者参考。鉴于人生观和文学观上将会长久存在

着差别与矛盾,这两篇文章自然是广大读者很需要的。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在中国青年中也存在着一种茫然、混乱、消极的思想。《怎么办?》的译者毫无疑问是想引进历史上一种影响过几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世界观,虽然不得不沿袭一种略嫌费解的名称。他是希望读者能坚定信念、摆脱庸俗,在考验中培养意志、超越自己。尽管我是译者朝夕相处的友人,我至今仍然感谢他为我们那几代人所作的贡献,把这本书当成我的生活教科书。

在翻译和编辑三卷本的《俄国文学史》(布罗茨基主编)之后,蒋路对下一步译什么书,曾有些犹豫,因为俄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比较短,从拉吉舍夫起到这时也不过二百年,虽然大作家辈出,可是总的说来人数还是有限。他又是对翻译选材抱着很严肃态度的人,坚持自己的标准。例如托尔斯泰,他并不想重译他的长篇,而后来选中的是《琉森》、《舞会之后》这种精彩深刻的短篇。甚而他理所当然可以译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序幕》,尽管有些朋友建议,他也未曾同意。何况岁月慢慢过去,有些佳作名著已有可读的译本,或者正在翻译中。他也无意于革命民主主义三大批评家的著作,翻译界有些同志正在由于过去介绍他们不足而在补课。过了一个时期,他终于决定集中力量选译卢那察尔斯基的重要文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在30年代受到中国进步文学理论家的重视,但失之零散,或系从英、日文转译。蒋路这时要译他的文论,结合平时所谈大概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卢那察尔斯基从青年时期参加俄国的革命运动,始终是在列宁的影响下,虽然在理论方面常常有错误,但他的思想总是在发展,进行新的探索。十月革命一胜利,他就回到国内接受了领导工作,任务很多很广,处理过文化建设上的许多难题,因而在结合党的理论、政策和处理实际问题上,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和意见。他曾长期在西方工作,在不少国家居住过,熟悉西方的现实和文化,在理解和判断问题上思想比较开阔,虽常

有错误,列宁仍有些偏爱他,看重他的才气。他评论更多的也是现代文艺问题和现代作家,包括西方作家。他当时的工作非常忙碌,头绪甚多,却也不放过发表见解的机会。有些文章是为出版新书写的序言,有些是为某一纪念日写的文章,有的甚而是在会上的发言,事后又经秘书根据速记稿整理的讲稿。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汇集了他的文学见解和学说,使他和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以及沃罗夫斯基,一同建立了本世纪初辉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队伍。可以说,在文艺理论方面,他是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西方浪漫主义时期一跃而使我们面临到一个距离很近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期。

——在这本书中,蒋路的译笔趋于更加完美,平易、稳健,含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雄辩力量。

——然而,卢那察尔斯基这些著作的翻译完稿时,已面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978年印刷初版时,“文化大革命”已将过去。1983年重印超过五万册,但俄国三大批评家的威信仍在,而西方文论的各派新说渐起。卢那察尔斯基这些宝贵的遗产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辜负了译本的苦心。

我常感到对历史的兴趣,或者说历史探索癖,是某些人的特点和优点。我觉得在蒋路身上就是这样。我对历史问题常是浅尝辄止。他对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本书,却会锲而不舍,穷其究竟。40年代我们曾同时读过一本俄国史《俄罗斯:最后来到的巨人》,作者库尼曾是美国的一位俄裔作家,此书是浅显的史话性质。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本有趣的俄国史。但我读过后只是还记得这本书,他后来仍时常翻阅。二十年后书已破旧,我看见他已请人重新装订,依然陈列在书柜中。在解放初期,他曾以几乎一个月的工资,收购了原法租界俄侨俱乐部流散出来的二十二卷本《俄文百科大辞典》,因为那是前沙皇时代自由派编辑的书,其中汇

集有关旧时代司法、宗教、制度、文化、器物以及各类贵族、名士等等的记载,在革命后的史册中已不见,而对于研究、翻译家,则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来源。50年代起,苏联的大批新的出版物源源运到中国,在代理处也可以订购。蒋路很注意文学及文化人士写成的回忆录,因为一经编辑者之手,这些书中往往附有尽可能详细的注释,当然更便于外国读者查考。通过青年和中年时期用心的准备,再加上他那种恒久不变的热烈的兴趣,就使他老年有了写作俄国文史漫笔的计划。诗人晚期常转向比较自由的散文,翻译家老年常想摆脱字句琢磨的限制,这都是很自然的愿望。然而,有如久受阻拦的山泉,一旦凿开便源源泻落。他就这样把史话当做一种题材择要而论,引经据典,且叙且议。他写这些的目的仍在于启蒙与引导。连同1997年以《俄国文史漫笔》为书名收进的那一部分,加上他去世后仍由东方出版社刊行的《俄国文史采微》(下篇)中收进的,共计五十四篇。不仅概括了俄国生活的诸多方面,史实翔实,而且篇中也处处流露出作者的热情、追求、品格和期待。这本书会为俄国文史的新一代的研究者指引出一条可行的道路。这是蒋路同志最后完成的(或者近乎完成的)一部著作,是他用心最切、致力最多的一件工作,它会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界人士认识到它的宝贵的价值。

为了照顾到某种叙述上的连续性,我不得不把蒋路在外国文学编辑工作上的贡献,放在最后这一部分来说。

从50年代后期大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编辑部的几位老专家被安排在社内由楼适夷同志主持的编译所工作,各自分担重点选题,定期完成。属于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有:孙用、蒋路、刘辽逸、许磊然以及后来进出版社的几位,还有不属于在职人员,而应邀加入的汝龙同志。可是,等到1969年秋天,出版工作因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中止后,大家都一起去了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蒋路同志被分配去使牛开垦湖边的荒地,从田间地头看去,他赤脚扶犁,简直就是俄国一幅绘画上的托尔斯泰。就这样度过了几年的岁月。1971年中央决定全国逐步恢复出版工作,蒋路于1973年回到北京。编译所没有重新建立,原来调出的几位同志又重回外国文学编辑部。他后来又担任了外文部一半以上业务的领导工作,开始了他后半期的编辑生活。像他从事文学翻译时一样,他依然怀着同样的热情,付出同样的精力、同样的时间,给当时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注入了充沛的力量。择要来说:他继续促进中央指定编选的“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工作;参加指导《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上下册的编写与审订的工作;审订《欧洲文学史》(新版三卷)、《俄苏文学史》(北京大学)、《东欧文学史》(社会科学院外国所)、《捷克文学史》(捷克学者著)、《波兰文学史》(波兰学者著);重新组织和审订丹麦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新译稿;他倾全力协助初次在中国出版的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全集三十卷的审订工作。而还有一项不太为人知的工作是他受委托完善俄国文学佳作在中国的介绍范围。这套丛书应该包含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和次要作家的优秀作品,充分选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的译者,为比较完整地研究俄国文学,以出版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一份财富。他欣然接受这个重要工作,也被公认是最理想的主持者。正因如此,在1981到198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目录上,才出现了波缅洛夫斯基、魏列萨耶夫、迦尔洵、斯列普佐夫、安德列耶夫、列舍特尼科夫、皮谢姆斯基,以及上下两卷的《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集》等书。

数十年的伏案生活之后,到了六十多岁,他才有机会去国外访问,亲眼看一看这个现代的世界,尤其是欧洲的面貌。先是去了捷克,以后又去了当时的西德,最后在1989年和五位老友访问了渴

望已久的苏联。前二者是一般性的访问,访问苏联却早已心向往之,且有此行所期望的具体目标。那是暑热的夏季,在苏联走了四个城市,其中基辅山洞修道院、古城普斯科夫、红场、彼得保罗要塞、深巷中的卢那察尔斯基故居,这些或许为写作史话储存或添加了一些印象。他本盼望能一睹托尔斯泰的别墅雅斯那亚·波里雅纳,但主人没有来得及安排,客人也以为来日方长。然而没料及这一游就是最后之游,返国不久,那个看来文化昌盛的国家却永远解体了。

回顾蒋路的一生时,我们看到他生长于对于国家或个人都是危难的时期。幸而有前辈的奋起,他才受到启示,为一个远大的方向所吸引,看清了目标和道路。他有着积极的性格、丰富的激情以及务实的态度,开始还从事过多种尝试,后来才大步前进。在俄罗斯文学研究和翻译这个曾是荒芜的领域,他先后在古典小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史研究方面,不论是翻译与著述,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足以成为后世继承和发展的楷模。对自己他力求严肃与严格,对同事和友人他满怀热忱。他对我说过,他永远感谢解放给他带来的无比的幸运。他一定更希望阅读更多的书籍、了解更广大的世界,为年轻一代更多服务。大家也都预期他能享受更长的人生。然而,他却意外地、永远地离开我们远行了。如今,虽然两年已经过去了,我仍常常感到他似乎还在我们的身旁,与我们同行。当然,人生总是会变化的,永存的只是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来的、使我们共同受益的那一切。让我们和将来的读者,永远记着他、怀念他吧!

2004年10月

蒋路同志其文其人

(序二)

陈 桑

这个文集称为“文存”，依我看来，可以有两层涵义。一是它并非作者亲手编定^①，可能有散佚尚未收入的文字；二是，蒋路同志在俄国文学以至外国文学领域的成就和贡献远不限于这个文集，它只是以文章形式存留下来的一个部分而已。当然，这部内容充实的文集，也很有意义，它让我们窥豹一斑，深信作者是积学之士，是“学者型的编辑家”。

《文存》的核心是《俄国文史漫笔》及其有关的遗稿（未定稿），由东方出版社合并而成的《俄国文史采微》。该书论及俄国（十月革命前）文史许多重大问题。重点在文学方面；有些文章则亦文亦史——与文学有关的历史方面问题，只有少数是历史问题，但也大多属于文化史范围。作者谦称本书为“漫笔”、为“采微”，但它绝非仅供酒后茶余谈助的一些遗闻轶事。它类似我国清代以前一些学者的考异或札记，但不限于论述某人某事的片断，而常常是完整的简史性的文章。只是由于作者的风格简炼，把许多内容丰富、原可

^① 当然，作者亲自编定的文集，不少也称为“文存”。我说的是另一层意思。

写成鸿篇巨制的文章,浓缩为短小精悍的文字,收成这一本篇幅不大的集子。文如其人,这也正是作者谦谦君子的剪影。

蒋路同志说:他在这集中论述的是“方家学者无暇顾及的”题材,并寻找“新选题和切入点”,因此他所涉及的是新领域,而新“切入点”则是人们曾经涉足的问题的新的方面。他谦虚地说这是“粗浅的尝试”。实际上在新的题材或其新的方面,对其探索和搜罗史料的工作都是相当艰巨的。然而本书却是史料丰富、系统的著作,而这些史料并非现成的、俯拾而得的,而是作者在其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进而钩沉索隐、集腋成裘的。是的,确实是集腋成裘:《采微》书末附的几段史料断片以及如斯庸同志所谈到的,关于《加尼特夫人》一文蒋路同志是从4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继续一点一点搜寻”材料而写成的^①,两事均可作为明证。

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评述本书的特点,首先就是史料完整而原本穷末,翔尽而具体确切。就从开卷的《混血作家》谈起。我们通常只注意作家的出身是平民或名门贵族,本文却以“血统”为切入点。我们固然也知道俄国神职家庭出身的文学家的血统纯正,或者因《彼得大帝的黑奴》而得知普希金的外曾祖父是黑人,而在这短文中列举具有异族血统的俄国作家却如此众多;对于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大作家,我们也只是由此才知道他的祖籍是德国,而“托尔斯泰”一姓原来源自德语 Dick。作者决非偶然将本篇置于卷首,显然它是经过多方考证写成的。

俄国文网之密在欧洲可说是仅见的,但我们只知道片鳞只爪。《采微》以这一问题作为重点之一:直接有关的为《书刊审查》、《流放中的作家》,稍稍间接的有《第三局和舒瓦洛夫》、《“俄国的巴士底狱”》以及《西伯利亚流刑史话》。在这一组文章中,先是缕述从

^① 《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期第57页。

16世纪起俄国书刊审查的开始,18世纪末因法国大革命的震撼而加剧,叶卡捷琳娜二世首先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成立的书刊审查委员会,亚历山大一世首次颁布的审查条例……直至1865年颁布的《暂行法规》以及最后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策划反动措施……继而缕述臭名昭著的第三局(旧译“第三厅”)的最初成立时间,它在所属的御前办公厅里所承担的任务,它的职权和属下五处的分工,它与宪兵团的关系,它的残酷而有时是捕风捉影、深文罗织的倒行逆施……进而论述彼得保罗要塞,从它的具体所在地,建筑结构,规模和沿革到它的成为政治监狱以至囚犯在这里所受各种折磨和瘐死。最后则是施用流刑的开始及各个具体流放地。(大家知道,流放固然是欧洲各国共同使用的刑罚,但俄国因其有西伯利亚这块广袤而严寒的疆土而使用得更广泛,并成为更残酷的手段。)特别是在上述各篇文章里,作者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各个时代、各个历史事件中俄国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们(以及各政治犯乃至无数人民)所承受的各种非人的遭遇、折磨、煎熬、严刑以至杀害。阅读这几篇文章,我们像但丁那样随着维吉尔游历了这个黑暗而惨无人道的文字狱。这几篇文章正是以多方面的充分史料写出一部完整的俄国文祸史的几个重要部分。

蒋路同志关心俄国作家。在《采微》中除上述的作家血统和文祸史外,还考证他们的年寿,笔名和匿名,出版业和稿酬以及他们与高加索战争,他们与决斗,乃至他们笔下的多余人、茨冈人形象,最后还具体地谈到恰达耶夫、别林斯基、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中奥莉加的原型)、皮谢姆斯基(论战性作品)和迦尔洵等作家和批评家。这些文章材料之丰富,涉及面之广,真是更仆难陈。我只想着重谈一下《文学社团》。该文历数自18世纪30—40年代至19世纪晚期的文学家的社团活动。从文学社团的雏形——家庭晚会,到正式的文学组团——“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赫列斯科夫的

和杰尔查文的文学小组、“俄国文学友好协会”、“文学、科学与艺术爱好者自由协会”、“俄罗斯语文爱护者座谈会”、“阿尔扎马斯社”、“俄国文学爱好者自由协会”、“绿灯社”以及 19 世纪 30 年代斯坦凯维奇和赫尔岑分别领导的大学生小组、40 年代的西欧派、斯拉夫派、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等非纯粹文学社团的小组……作者逐一论述各个小组或社团的组织者和主要参加者以及他们的主要活动：作者和听众间的朗诵作品、征询意见、指谬匡误；编辑和出版家在此罗致和团结撰稿者或反馈书刊销售情况；穿插着从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论争和嬗递，古文和今文的论战，各个组织的进步或保守的性质，以及近似“处士横议”的议论时事、议论社会政治等话题——反封建农奴制、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等倾向问题……宛如一部“儒林外史”，固然不蕴含着讽刺或褒贬，也不基于观察和虚构，而是由大量真实、确切的史料织成的历史长卷。

这里我还要谈两篇文章，一是《俄国作家与共济会》。我学识谫陋，只是因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的参加和皮谢姆斯基的小说《共济会员》的书名才知道这个组织。这里则告诉我们该组织的由来、最初的性质，在欧洲各国的传布（其信徒甚至有众多国王、元首和名流），和其他宗教的关系，于 18 世纪 30 年代初之传入俄国，由早期奉公守法和后此的分化和神秘化，以及它被禁止和开禁、十二月党人“幸福同盟”的参加和旋因政治见解分歧而分道扬镳，最后并论及部分作家同它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见诸自己作品中的有关思想见解。共济会是一冷僻的问题，其史料得之不易。作者如不作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是不能如此写得原原本本的。

其次是史料更加难以搜求的《早期中俄文化交流》。这是本书中出类拔萃之作。它从最早的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团、俄国早期汉学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俄语教学以及留俄留苏等几个方面，缕述

从顺治十一年(1654)派驻我国的第一个正式使团开始到清末民初为止的两国文化交流。难能可贵的是,文章不止概括地介绍有关情况,而且一一具体陈述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及各自的著译以及我国开办俄语教学的具体机构,其学制和培养出来的人才的数字,以至其中卓有成就的人士。就体例、系统性和史料而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中俄文化交流史略。我见过几本同类的著作或论文集,它们或是侧重议论而史料甚少;或是知难而退,限于20世纪而不追溯此前史料难求的17至19世纪的历史。只有以考据中外文化交流著称的戈宝权同志写过“长文”《谈中俄文字之交》^①,也论述三百年来有关的“全部历史”。该文同蒋路同志的文章彼此互有详略。概括地说,除早期概况互见短长外,差异较大的是:戈文详于中国文学在俄国的译介(其中有由法、德文转译的《玉娇梨》、《好逑传》和《聊斋志异》中四个短篇小说;重点在20世纪以来俄苏文学的中译。)以及俄国几位作家对中国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见诸文字的反应。蒋文则详于早期俄国汉学家,清代和民国俄语教学的机构(学校),我国派员留俄留苏的概况以及上述教学和留学所培养的人才和知名人士。因此二文可以互相补充,可以说差堪伯仲。大家知道,戈宝权同志在俄、苏工作多年,在收集材料上可以“因利乘便”;而蒋路同志“至1989年方首次踏上俄罗斯的大地”,只作为期半月的访问,因此他只能在国内图书馆,孜孜矻矻,勤奋搜罗。二者相比,确实难易悬殊!史料丰富充实的文章还有《话谰帝王》、《话谰贵族》、《修道院》、《红场旧事》等等,均属文化史范围,也都十分出色,但以限于篇幅,只好忍痛割爱,不一一论及了。

另一类论文以分析细致,立论平允见长。先谈《合理的利己主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第171—186页。